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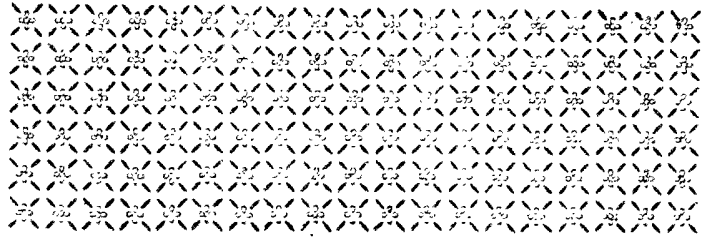
012522

萧县教育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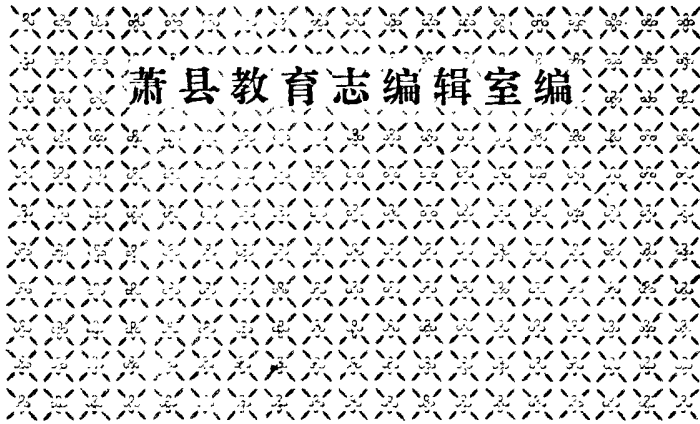
XIAOXIAN JIAOYUZHI

萧县教育志编辑室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

萧县教育志



萧县教育志编辑室编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萧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高梅田
副组长：李令为 孟治平
成 员：杭春光 张长福

萧县教育志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高梅田
副主编：李令为 张盛铭 孟治平 王俭荣
编 辑：纵封良 许敬新 张 朔 程祖仁

制 图：程祖仁
摄 影：高梅田

萧县教育志审定单位

萧县地方志办公室
宿县地区行署教育委员会
安徽省教育志编辑室

萧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高梅田
副组长：李令为 孟治平
成 员：杭春光 张长福

萧县教育志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高梅田
副主编：李令为 张盛铭 孟治平 王俭荣
编 辑：纵封良 许敬新 张 朔 程祖仁

制 图：程祖仁
摄 影：高梅田

萧县教育志审定单位

萧县地方志办公室
宿县地区行署教育委员会
安徽省教育志编辑室

萧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高梅田
副组长：李令为 孟治平
成 员：杭春光 张长福

萧县教育志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高梅田
副主编：李令为 张盛铭 孟治平 王俭荣
编 辑：纵封良 许敬新 张 朔 程祖仁

制 图：程祖仁
摄 影：高梅田

萧县教育志审定单位

萧县地方志办公室
宿县地区行署教育委员会
安徽省教育志编辑室

蕭縣教育志

邵明



序 一

曾广田

《萧县教育志》在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的关怀下，经编辑人员殚精竭虑、五年笔耕，即将面世。这部书开本县教育专业志之先河，可谓创举，值得祝贺。

萧县，地处黄淮海平原南端，地近邹、鲁，有楚遗风，文物颇盛，历史悠久；萧县人民，既秉北方人强悍质朴之性情，又承南方人聪慧灵秀之气质，自古重教慕学，勤奋刻苦，因此文化发达，人才辈出。其教育事业，从明朝的书院，到清朝的义学、私塾、学堂，以至民国的学校，源流清晰，形式纷呈，时盛时衰，不绝如缕。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，地方国、共、汪伪三权并立，斗争残酷激烈，各方仍竞相办学，教育一直弦歌不辍。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教育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材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，做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萧县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新时代。虽然，在其发展过程中历经磨难、几起几落；但是，总趋势还是曲折前进的。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萧县教育出现了一个全面振兴的黄金时期，全县教职工正沿着改革、开放的航道，励精图治，谱写着前无古人的伟大篇章。

教育乃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。《萧县教育志》真实地记录了萧县教育从清末以来一百多年间发展的历史；科学地总结了经验教训、利弊得失；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了历史鉴戒；也为发展萧县教育事业提供了大量真实生动的乡土教材。它必将起到“资政”、“教化”、“存史”的重大作用。

《萧县教育志》，在编纂中较好地体现了“真、深、新”的原则，不失为一部信史。所谓“真”，指资料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、筛选严格、翔实可靠；所谓

“深”，指内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，褒贬有度、记述得当；所谓“新”，指内容形式、章法体例，突破传统拘囿，显出特色。不过修志之难，尽人皆知。由于诸多条件限制，难免百虑之一失，期待世人或续订者补正。

《萧县教育志》付印在即，遵编者之嘱，勉为其序，以表欣慰。

序 二

高梅田

《萧县教育志》是萧县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业志。尽管，编纂工作浩繁艰巨，困难重重；但是，在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关注下，全体编写人员废寝忘食，辛勤劳动，历经五个寒暑，四易其稿，终使志书付梓刊行。这是萧县教育史上一桩值得庆贺的盛事。

萧县历史悠久，英才代起，盖因人民有景学重教的优良传统，教育一直比较发达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萧县教育才面向人民大众，得以蓬勃发展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，萧县教育又备受摧残，濒临崩溃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拨乱反正，百业振兴，萧县教育事业又迅猛发展，出现一个黄金时期。值此盛世修志，真实地记录萧县教育事业发展的历程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以告慰前人，策励当代，鼓舞后人，起到资政、教化、存史的作用，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，也是本书编写的目的。

《萧县教育志》史料远溯至清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。主要记述了清末以来百余年来萧县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兴衰起伏、利弊得失。编纂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为准绳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实事求是、秉笔直书。史料力求翔实可靠。内容本着立足当代，详今略古，详近略远的原则，尽量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。形式注重文图并茂。在编排体例上，采用类目体。全书包括概述、大事记、志书主体、附录四大部分；主体部分按类分为16编，互相联系，形成序列。每编又以条目、子目横向展开，纵述史实，力求眉目清晰、领属分明，使各部分有机结合，融为一体，汇为一志。全书注重了思想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，以期经世致

用，有裨于社会风教。若能如此，也就实现了我们的初衷。

《萧县教育志》在编纂过程中，蒙国内不少专家、学者、教授曾给予热情指导。全县广大教职工亦大力帮助。北京、上海、江苏、安徽等地档案馆和一些高等学校的图书馆，为征集史料提供了方便，在此一并致谢。但由于书中涉及的年限跨度大，加以旧中国战乱频繁，兵燹灾害不断；而解放后，萧县行政归属和辖区范围，又多有变动，致使资料残缺，征集困难；再加编者水平所限，难免疏漏谬误，敬请方家贤达匡正。

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为准绳，实事求是地记述萧县教育的历史和现状，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上不立限，根据掌握的资料上溯；下限断于1989年底。

三、本志每一时期取事区域，限于当时行政区管辖所及。

四、本志结构分为概述、大事记、主志、附录四部分。主志部分采用类目体，分类目（编目）、条目、子目三个层次。全书共16个类目，77个条目，174个子目。

五、本志采用记、志、传、录等体裁，以志为主，辅以图、表、照片。其中图22幅，表72份，照片34幅。

六、《大事记》采用编年体，个别事件采用记事本末体。

七、本志不为生人立传，入传人物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。

八、本志涉及数字的书写，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的《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》为准。

九、本志涉及建国前历史纪年，一律夹注公元纪年。书中“建国前后”系指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”。

十、书中一些专用名词的注释，一般在其第一次出现时夹注。

十一、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内外有关各级档案馆、图书馆和各有关单位，以及部分当事人、知情人提供的文字、口碑资料。为节省篇幅，书中不一一注明出处。个别史实与1989年12月出版的《萧县志》有出入，采用时以编者鉴别的资料为准。

概 述

一

萧县位于安徽省北部边缘的豫皖苏交界处，东邻徐州要冲，西靠中州腹地。面积1861.119平方公里。现辖13个区（镇）、69个乡（镇），1 049 851人。

萧县有两千多年的建置历史。春秋时为萧国，秦置萧县，南北朝北齐天宝七年（556）改为承高县，隋开皇六年（586）改为龙城县，开皇十八年（598）改为临沛县，大业元年（605）复改为萧县，沿用至今。

县境东南花甲寺新石器遗址出土的文物证明，远在四、五千年以前的氏族公社晚期，这里就有人类繁衍生息，创造了古代的文化。境内名胜古迹很多，著名的有皇藏峪、天门寺、圣泉寺、萧窑遗址等。

历史上，萧县是古黄河的泛道，地多沙瘠，水涝相寻，富者无积贮，贫者不能谋朝夕，加以赋役繁重，所以，农民起义接连不断。民国时期战乱频仍，武装斗争迭起。尽管如此，萧县人民“尊儒慕学”的重教风尚和勤学刻苦的美德仍得以发扬，因此地灵人杰，古有南朝开国皇帝刘裕；近代有徐树铮、李明扬、刘汉川等；当今文教艺术界知名人士，有孙叔平、刘开渠、萧龙士、朱德群、王肇民、王子云、邓伟志等。真是灿若星辰，不胜枚举。

二

萧县教育历史悠久。明永乐年间就设置了易安书院，清朝先后设置过东壁书院和旧、新龙城书院。清末又出现了义学和私塾。私塾教育是封建时代一种陈旧的民间办学形式，民国时期曾几度取缔和厉行改良仍相因未绝，直到抗日战争结

束才完全废止。这些办学形式虽然陈腐守旧，但是，对本县文化教育的传播和发展却起了一定的中介作用。

萧县学校教育是在19世纪末叶新潮流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。“戊戌变法”失败后，一些开明人士积极倡导“废科举、兴学堂”。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龙城书院（新）改设小学堂，书院主讲杨炎昌任堂长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清廷下诏废科举。县设劝学所，孟昭潜任所长。学堂迅速增加。县城文昌宫、南部朔里店、北部穆集、东部褚兰、西部张大屯等处相继办起蒙养学堂。这些学堂，以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为宗旨，尊孔读经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，兼学数理等科，试图以局部改良来适应新潮流。这时期的教育带有浓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。

民国元年（1912），县署设立学务课，专司教育。同时，龙城书院小学堂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。乡绅心存科举积习，认为学校是进身阶梯，也多以办学为荣，一时学校应运而勃兴。这年全县公、私立小学骤增至百余所。后因战乱，经费和师资难以为继，相率解体，仅存30余校。民国7年（1918）后，在王寨、郝集、褚兰先后设立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县立高等小学。民国9年（1920），全县有小学近百所，入学儿童3292人，适龄儿童入学率为3.73%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政局变幻无定，政令不一，教育事业勉强维持，发展迟缓。

民国17年（1928），北伐战争结束，南北统一，国民党在萧县建立政权，局势暂趋稳定，地方教育也得以稳步发展。当时，县教育局，由东南大学教育学士魏绍舜任局长，把全县划分为四个学区，成立“教育设计委员会”，广筹教育经费；创设实验小学，裁并四乡小学，以地名更定校名。嗣后历届局长均循此制。民国19年（1930），全县有小学126所，入学儿童7024人，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.01%。同时民众教育也开始兴办，先后成立了县立民众教育馆、县立农民教育馆、实验民众学校和民教班。民国23年（1934），改三年制县立简易师范为四年制县立简易乡村师范，以实施“生活教育”、“推进乡村建设”为目标，力图使学校成为推动社会、改造乡村的原动力，用“做学教”合一的方法为乡村建设培养人才。

民国以来，萧县教育的发展，得力于乡绅倡办、群众支持、内行人监督辅导。这一批内行人，多赖于师范教育的培植。为造就师资，从宣统二年（1910）至民国11年（1922）先后创办四期师范传习所，民国12年（1923）创办三年制简易师范，后改为四年制简易乡村师范，培养了一批合格教师，使以后学校数量的

增加、教学质量的提高，有了根本的保证。

民国27年（1938）5月，日军大举侵犯，萧城沦陷，城乡学校停闭。是年秋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，相继恢复了高小十余校，初小六、七十校，在校学生3500人。民国29年（1940）国共合作的县政权分裂，县境内共产党、国民党、汪伪三方政权鼎立，纷纷兴办学校，争夺青少年一代。

民国34年（1945）统计，抗日民主政府办小学282所，学生14385人；国民党政府办小学113所，学生8511人；民国33年（1944），汪伪政权办小学88所，学生4827人。这时期，抗日民主政府办了正风中学、萧县中学，国民党政府创办了县立初级中学，汪伪政权在黄口小学内附设两个初中班。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统辖萧县，实行“政教合一”的教育体制；进行小学教师登记、检定；调整教学经费；在城南梅村和城西北角上堂子分别为县立简易师范、县立初级中学建校舍。由于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，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，地方财力困难，到民国37年（1948）解放战争胜利前夕，全县只有小学210所，学生22937人；师范1所、中学3所，学生计1007人。

萧县人民素有慕学重教之风，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办学校。如孟昭潜劝导设学，刘汉川创办“女子小学”、“贫儿教养院”，冬岭和尚创办“佛教会小学”，刘子遇创办“私立徐西中学”等，都为发展地方教育事业贡献过力量。有些萧籍军政人员也热心办学，如徐树铮在北京创办“正风中学”，王仲廉在太和创办“国立二十一中”、在徐州创办“树德中学”，方先觉在徐州创办“正德中学”等，都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
新中国建立前，在中共萧县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县立初级师范学潮迭起；实验小学学生查缴和焚烧日货；黄口小学的师生参加“黄口暴动”；在日伪高压下，一些爱国教师暗中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；众多小学教师参加了“索薪”、“加薪”斗争。许多正直、善良的教育工作者，在极其恶劣的政治条件下和生活环境中，传授知识，盼望解放，终于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。

三

1948年11月，萧县解放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县政府根据“维持现状，即日开学”的政策，接管旧学校，组织原有教师复校复课，吸收大批知识青年充

实教师队伍。完小经县核准为公立；初小改为民办；接收县立初级中学、私立彭城中学、私立徐西中学、简易乡村师范，合并组建萧县中学。学校贯彻“为国家建设服务，为工农开门”的方针。废除国民党“党义”、“公民”等反动课程；禁止体罚学生。由于连年水灾，校舍毁坏，县委要求“坚持灾区教学，不垮校，不减员”，学校组织教师开展勤工俭学、生产自救。1952年底全县有中等学校4所，学生1389人；小学620所，学生48599人。同时，农村成立了冬学和民校，城镇办起了职工业余学校，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扫盲运动。

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在“一化三改造”为主要任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，本县根据“整顿巩固、重点发展、提高质量、稳步前进”的方针，对初等教育进行了整顿，强调“教学工作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，教师的主要责任是做好教学工作”，“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好各门功课”，从而克服了学校中的混乱现象。同时学习苏联教育经验，对旧教育在内容和方法上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。全县教师学习凯洛夫主编的《教育学》，形成了一次教育理论的大普及。教学内容重视讲清基本概念，落实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；教学方法上运用“五个原则”、“五个环节”；学校完善了规章制度，教育、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，大幅度地提高了教育质量。

对旧教育改造的关键是争取、团结、改造教师，以无产阶级思想肃清封建的、买办的、法西斯主义的思想。县委狠抓了培训干部、改造教员这一环节，利用假期举办学习会、报告会，使教师提高政治觉悟，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。1952年，对干部和教师集中进行思想改造运动，批判“亲美、恐美、崇美”等奴化思想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。通过土改、镇反、三反五反、肃反等政治运动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和政治理论学习，绝大多数教师，完成了思想政治观点的转变。

在教师和学生关系上，取消了国民党时期的“训导”制度，实行“教导合一”制度。教师以身作则，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；师生民主平等、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逐渐形成。学校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。

为了解决师资不足的困难，1951年春建立萧县初级师范学校，县长单劲之兼任校长。随后又开办了中师速成班、二年制小学教师轮训班，为本县和淮北地区教师队伍输送了大批新生力量。同时在全县各类学校普遍开展教研活动，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。1957年全县有中学5所31班，教师127名，学生3323人；小学620所，学生65521人，适龄儿童入学率47.6%。

1957年下半年，反右斗争扩大化，教育系统1825名教职员369人被错划右派，占全县右派总数553人的66.75%。其后，在极“左”思想影响下，教师长期成为被整的对象，严重挫伤了积极性。1958年，贯彻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”的教育方针，批判“右倾保守”、“脱离政治、脱离劳动、脱离实际”的倾向，提出了全党全民大办教育，采取多种形式办学和“两条腿走路”的方针。同年三月，在“大跃进”的浪潮中，黄口农业中学在全省率先创办，随后全县相继办起农业中学22所。普通中学增至14所；师范学校由原来的5班增至23班，学生由228名增至1069名；小学招生36941人，是1957年招生数的3.6倍。有的学校师生实行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学习、同劳动”。学校大办工厂、农场，开展“勤工俭学”活动，冲击了课堂教学，削弱了教师、教材和课堂教学的作用。随后在教师中开展“反右倾”、“拔白旗”、“评上、中、下游”等活动，严重地影响了师生关系和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。在“大跃进”形势下，“教学竞赛”、“指标教学”等做法甚为普遍，致使学校出现了浮夸现象，“双百分班”、“双百分校”竞相涌现。由于教育事业盲目发展，超越了国民经济和师资、设备的承受能力，教育经费严重不足，校舍、设备奇缺，大批不称职的教师和不合格的学生涌进学校，造成教育事业比例失调，教育质量急剧下降，被迫从1961年起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整顿，调整中小学布局，精简教师队伍，贯彻全日制中小学工作条例；教学上强调抓基础知识、基本技能，才又很快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。1962年贯彻“广州会议”精神，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，为部分错划“右派”的教师“摘帽”，各级党政领导关心教师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，教师的积极性又开始调动起来。1964年，大力推行“两种教育制度、两种劳动制度”，实行多种形式办学。小学有公办小学、耕读小学、简易小学；有全日制、半日制、早、中、晚班。中学除普通中学外，又创办了萧县龙山农业技术学校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。1965年下半年全县有小学1680所，同1949年相比，增长1.87倍。教师4139人，增长2.34倍。学生116377人，增长2.63倍。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1.1%。普通中学由1所增加到13所，教师291人，学生5623人，农（职）业中学43所，学生3145人。中等师范学校一所，学生236人。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，萧县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，虽然经历了大起大落，但总趋势还是曲折前进的。

四

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，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。“文革”初期，中小学“停课闹革命”。许多校干、中老年教师被打成“黑帮”、“牛鬼蛇神”、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受到揪斗、游街、劳改、关押、殴打、抄家、刑讯逼供等形式的残酷打击和迫害。“文革”中期，实行“斗、批、改”，全县5700名工人、贫下中农进驻学校，改造教育阵地。他们把培养目标规定为“培养学生成为善于分析党内资产阶级，同走资派作斗争，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”。1971年，萧县县委决定用10个月的时间，分别集中中小学教师2280人，连续举办两期“大会战”学习班，批判“前17年修正主义路线”，清算“走资派”，揭露教师中的“坏人”。实际上是组织教师斗教师。罗织罪名或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使45.6%的教师受到冲击，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，教师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。“四人帮”炮制的“两个估计”出笼后，对教师的迫害变本加厉，说“教师一天只劳动三四个小时，是劳动力的极大浪费”。1975年，县委作出了教职工分期分批下放劳动的决定，同年9月下旬，2300名教师首批下放到生产队，随后又分两批下放3300名，在生产队集体吃住当社员，接受贫下中农的“再教育”，每期半年。为了改变教师队伍的成分，全县还选派15000名工农兵担任兼职教师，占全省11万兼职教师的1/7。在学校领导、干部的选配，大搞“闹而优则仕”。强行将部分中学下迁到公社办，小学下放到大队办，公办教师回原籍任教，造成教师思想上的极大混乱，形成大队间教师“多的多、缺的缺”。1971年县委提出“小学不出村，初中不出大队，高中不出公社”的口号，全县小学由587所增至754所，新办戴帽初中377所，初中由11所增加到462所，高中由2所增加到38所。在校学生由7716人猛增到46043人，教师由422人增至2198人，使得人、财、物全面紧张，办学条件极差，教师严重缺乏，削弱了基础教育，造成教育教学上的恶性循环。同时还否定课堂教学，取消基础理论课，实行“开门办学”，开展“革命大批判”；缩短甚至一度取消寒暑假，把学校教育纳入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，常年把教师当作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义务劳动力，致使各科教学任务无法完成。“文革”后期，又强制推广郭庄大队育红学校的“办学经验”，诸如“以阶级斗争为纲，上好阶级斗争主课”；“实行校队一体，把学校工作纳入‘农业学大寨’的轨道”；只开“政文、农技、军体、劳